



中青年学者文库

赵玉敏◎著

孔子文学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青年学者文库

赵玉敏◎著

孔子文学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文学思想研究/赵玉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16286-6

I. 孔… II. 赵… III. 孔丘(前551~前479) — 文学思想 — 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8976号

书 名: 孔子文学思想研究

著作责任者: 赵玉敏 著

责任编辑: 尚 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86-6/I·21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0.5印张 294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孔子文学思想研究 08JC751018)

序

2004年初夏时节,与几位友人一起乘车去四平开会。放眼望去,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满眼苍翠,一派生机,松辽平原上的风舒适而清爽。东北的春天荒凉而短暂,由于冬天积聚了太多的寒冷,所以春天总是用强劲而猛烈的力量驱散潜藏于大地深处的寒气,整个春天常常是在春风的呐喊和呼号中度过的。因此东北人对万物生长、东风骀荡的春天体验,实际上已经是初夏时节了。行进在绿野千里的东北平原上,不禁想起了《论语》中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境来,这种“东鲁春风吾与点”的诗意人生境界,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也是古代士人君子的人生向往与追求。兴味正浓时,同行的赵玉敏同学忽然问起博士论文的题目来,我说,那就写“孔子文学思想研究”吧。

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文学理解成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固定的艺术样式,这与孔子时代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差别。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年—1801年)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理论,而当人们热衷于分析“六经皆史”的理论蕴含的时候,却较少有人注意与“六经皆史”理论平行的另一个命题——“六经皆文”。清代颇负盛名的文学家袁枚(1716年—1797年)是“六经皆文”的有力倡导者。他在与师友论学的信函中,反复强调六经的本质是文学是文章,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答惠定宇书》)、“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答定宇二书》)。面对六经,袁枚关心的不是原道征圣的抽象意义阐发,而是强调了经学的文章属性和审美意义,经学归入了文学,也就归入了他倡导的文学的性情与灵机,因为他的文学观念是“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管堆垛。”(《随园诗话·卷五》)而在钱钟书先生(1910年—1998年)看来,“六经皆史”已是老生常谈,既然可以把经学解释成

历史,为什么不可以把历史理解成文学,理解成诗歌?从历史的角度,可以是“古诗即史”,那么从文学本位上说,也可以是“古史即诗”,“由是观之,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在钱先生的理论里包含了“六经皆史”的另一种表达:“六经皆诗”。

经学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是文学的,也是诗学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传授的“六经”,是文化的经典,也是文章的范本。“直言曰言,修辞曰文”^①,孔子为《周易》之《乾》《坤》两卦作《文言》,《文言》是对天空与大地的哲学阐释,更是春秋时代新体文言的文章典范,所以清代阮元(1764年—1849年)谓《文言》乃“千古文章之祖也”。钱基博先生(1887年—1957年)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章之规模具也。文言者,折中于文与言之间。在语言,则去其方言俚俗,而力求简洁;而于文,则取其韵语偶俪,而不为典重。音韵铿锵以为节,语助吟叹以抒情,流利散朗,蘄于辞达而已。后世议论叙述之文,胥仍其体。自文言而益藻密,则为齐梁之骈体。自文言而溢疏重,则为唐宋之文。此其大较也。”把整个中国文章的发源,全部追溯到《文言》一篇文字是片面的,但是以《文言》为代表的“新体文言”作品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刻影响是应该肯定的。

从“六经皆文”“六经皆诗”的理论出发,孔子是中国文学的真正开创者,不仅仅体现在他整理《诗经》、注解《周易》、创立“春秋笔法”、提出“修辞立诚”“兴观群怨”等著名的艺术理论,即使从文学创作上他也起例发凡,引领天下。即便是哲学的论证,他也情绪饱满,富有气势。以《乾》《坤》两卦的《彖》传为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① 《说文·言部》谓:“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广雅·释诂二》:“文,饰也。”阮元《经室三集》:“《说文》:‘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所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谓:“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易传》作者以“大哉”“至哉”起笔，充满深情地颂扬天地的品德，是天空的赞美之诗，也是大地的赞美之诗。在这里，天地不是抽象的不动声色的客观物质，而是充满生机与情感色彩的生命运动。正是因为作者饱含深情，语言才是华美的、充盈的、富有诗意的，天空被描绘成“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是具有生命气韵的；大地被描绘成“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包含精神品格的，没有对天空与大地的深情含蕴，是难得有这样的文字礼赞天地的。即使以最严格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这样的文字都是抒情的、优美的、富有审美意蕴的。因此不必小心翼翼，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孔子不仅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文学家、文学理论家。

正如作者所说，“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冷寂的选题”，但是作者的研究还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先源于作者开阔的理论视野。本书一方面认真对待清代以来疑古学派在文献辨识上的学术贡献，一方面指出“疑古思潮疑古过甚的过激态度也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实事求是的释古的眼光审视经典文献，对孔子文学思想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论基点。其次是作者对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运用。本书对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金石简帛文献多有研究、多有引证，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发明，使得作者的理论创获建立在翔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上。再者，是作者逻辑分析的细致和严密。本书对“文言”、“诗亡隐志”、“乐亡隐情”等文学理论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分析周密细致，娓娓道来，叙述清晰，从容不迫，不强词夺理，不盛气凌人，表现出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和求实精神。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本书流畅的语言表达。文章总是要给人看的，学术文章也是文章，因此学术著作也应该注重表达，注重修辞。孔子本身是十分重视文采的，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本书是研究孔子文学思想的，当然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因此本书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

语言却生动而流畅,不艰涩,有波澜,很耐读。

“文”是什么,不单单是技巧、是修饰,更是光明、是照亮,是一切发光的东西。《乐记》里说“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只有内心情韵深厚,文采才会发亮;只有气韵饱满,神采才能飞扬。那些精神饱满情采飞扬的辞章,曾经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一个文学逐渐边缘化的时代,想起这些圣贤的言论,心中还是充满力量的。

是为序。

傅道彬

2009年12月13日冬夜

目 录

引 言	出土文献与孔子文学思想的再发现	1
第一章	周代礼乐文明与孔子文学思想的文化渊源	13
第二章	“文言”与春秋时代文学思想的经典表达	54
第三章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看孔子对《诗》文本的阐释	106
第四章	“《诗》亡隐志”:孔子《诗》学理论的系统考察	159
第五章	“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	200
第六章	“春秋笔法”与孔子的历史书写	239
第七章	孔子哲学的诗性智慧和诗化的人生理想	279
参考文献		303
结语		315

引言

出土文献与孔子文学思想的再发现

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冷寂的选题。孔子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孔子所使用的“文学”这个概念与今人的认识有许多不同,但孔子所确立的诸多概念和标准,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自春秋以降,无论是传统经学意义上的阐释,还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解读,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可谓不绝如缕,历久不衰。在这种情况下,重拾这样一个传统的论题,如果没有新材料或新理论的介入,试图寻找突破和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尤其是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代表的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给这一传统论题重新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文献带给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正以其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改变着以往我们对文学现象、文学观念很多自以为是的理解。简帛文献的出现,在极大丰富了孔子文学思想研究基础材料的同时,也使诸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样的争论有了较为明确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背景的变化,不仅使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契机,也使我們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一个较过去更为丰富、完整、系统,因而也更具文学史意义的孔子文学思想。

一、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几次考古发现

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来说,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并不仅显现于当代。西汉时期“孔壁中书”的发现,在史料的丰富和学术思想创新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孔壁中书”的所指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孔壁中书”是指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广义的“孔壁中书”则泛指这段时期多次发现的古文经,主要包括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汉书·景十三王传》)和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易》、《礼》、《春秋》各一篇”(《论衡·正说》)。

“孔壁中书”的发现对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从发现之初直至近现代都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或认为是刘歆的伪托,或认为其事“子虚乌有”,“其说亦殆不足信”。但随着近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大量简帛文献的频频发现,它的真实性逐渐得到了确认。“孔壁中书”对研究孔子文学思想的意义有二:在史料方面,丰富了可作为孔子研究材料的重要典籍《周礼》、《左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传》、《仪礼》等；在思想方面，引发了对中国学术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今古文之争。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①在这二者之中，尤以后者的影响为巨。

“今古文之争”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产生及流变的过程几乎是整个中国学术史的缩影。它的所指既包括古今文字的异同，也涵盖着治学思想和学术观念的差异，并因此而形成两个鲜明对立的学术流派——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两派之间对于孔子及古代经典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周予同先生有极为明晰的归纳：“他们（指古文学派）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将孔子认为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而今文学派则以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作的，这里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这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总结一句话：今文学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今古文之争的重心是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孔子文化角色定位的差异，而这恰恰也是研究孔子文学思想必须厘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历史上的“孔壁中书”现在已成为我们所熟知的传世文献，但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究来说，其价值和意义并不逊于当代的任何考古发现。

进入20世纪，中国的考古学有了极大的发展。自40年代以来，仅简帛文献的发现就有20次之多，尤其是70年代之后，几乎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发现。在这些发现中，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共有三次，即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

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在该墓中同时出土一件木椁，上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的字样，说明此墓有明确的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②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年。马王堆出土帛书 26 件,计 12 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历史、哲学典籍,也有自然科学的著作,还有各种图籍和杂书。马王堆帛书涉及到的与孔子直接相关的儒家文献为《周易》。内容包括:一、《周易六十四卦》,即通常所说经的部分。存 93 行,约 4900 余字,除个别字残损之外,六十四卦完整无缺。与传承的以及各家称引的今文本、古文本、王弼本等各本对比,卦名及卦爻辞的异文多属文字通假,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卦序则和今本完全不同。二、《周易·系辞》。分上下两篇,首尾章与今传本《系辞》一致,中间略有不同,个别章节的文字差别较大。三、《周易六十四卦》卷后佚书五篇。包括本有篇题的《要》、《繆和》、《昭力》和整理后定名的《二三子问》、《易之义》。

郭店楚简于 1993 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 1 号战国楚墓。此墓虽经盗掘,但仍出土竹简 804 枚,共计 13000 多字,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以儒家类文献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其中儒家作品 11 种 14 篇,包括《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及《语丛》4 篇。竹简有不少篇目不见于儒家典籍,有些虽见于今本,但在篇章、结构及次序方面有较大差异,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辨证孔子至孟荀之间儒家思想的演变轨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较之历史上的其他考古发现,上博简的发现经过较为特殊。它并非直接得自于出土地,而是被盗掘后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辗转购回。竹简数量前后两批共计 1700 余枚,约 30000 多字。这批竹简目前已由上海博物馆陆续整理出版,以儒家文献为主,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文学、音乐、语言等各个方面,全部为秦焚书之前的战国古籍。篇目如《孔子诗论》、《性情论》、《缁衣》、《鲁邦大旱》、《民之父母》、《子羔》、《从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上博简虽然还在陆续整理出版,但其对中国学术史、文学史以及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重大影响已经显现。对于这一点,竹书出版后围绕《孔子诗论》兴起的上博简研究热潮即是最好的证明。

除以上三次考古发现之外,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论语》和《儒家者言》,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木牍文书等,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出土文献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

出土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①20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对孔子文学研究的影响,则从文学的层面再次证明了这位国学大师敏锐的学术感觉和非凡的学术预见。

20世纪的出土文献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学术背景的转移、基础文献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三个方面。

(一)走出疑古时代:出土文献之于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背景意义

传统的孔子文学思想研究,其理论背景是建立在疑古史观的基础上的。历史上的疑古思潮,萌发于战国,兴起于唐宋,盛行于清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达到高潮。由疑古而兴起的对古书和古史的辨伪之学,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使人们不再以迷信、盲从的心态对待古代文献和古代的经传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创新,带来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古史辨派”,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显著地改变了古典学术的面貌,对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疑古思潮疑古过甚的过激态度也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对待古书真伪这个问题上,《左传》、《周礼》、《易传》、《诗序》、《礼记》等大量重要历史典籍的真实性都曾受到怀疑。如郑樵、朱熹怀疑《毛诗》;吴棫、朱熹、阎若璩、惠栋等怀疑《仪礼》;万斯同、万斯大、姚际恒等怀疑《周礼》;欧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阳修、叶适、崔述等怀疑《易传》；刘逢禄、龚自珍等怀疑《左传》；姚际恒、杨椿等怀疑《孝经》。历史上的这种辨伪之学被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下来并发挥到极致，在他们看来，先秦的古籍几乎到了“无书不伪”的程度。

20 世纪几次重要考古发现前的孔子文学思想研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上的。它使学术界对研究所需基础文献的选择显得格外地谨慎，凡存有争议的文献，宁信其伪而不信其真，一律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例如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样一个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文献问题，他们认为“六经”既不是古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今文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诗》、《书》、《礼》、《易》、《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五部书；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① 这种定位不但使以往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文献选择除了《论语》之外几乎无所可用，同时也限制了研究的规模和理论的创新，从而使孔子这样一个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在《诗》学思想之外的文学思想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现和阐释，其文学史的意义自然也没有得到恰如其分地彰显。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对孔子的思想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都是明显的缺憾。

20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大量简帛、青铜器铭文的出土，使学术界对古史、古书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如银雀山汉墓就出土了曾被视为伪书的古籍《六韬》、《尉繚子》等，而《孙子》和《孙臆兵法》的同时出土，更是使历史上几成定论的《孙臆兵法》的“伪书”案在出土文献面前不辨自明。李学勤先生先后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等著作，倡导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学术界热烈的回应和支持，在文学界也有了很多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这种学术背景的转换，使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史料困境有了突破的可能。

^①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70 页。

（二）简帛文献：出土文献之于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的史料意义

正如上文所言，在疑古思潮的学术背景下，研究孔子的著作虽然很多，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礼记》、《易传》、《春秋》中保存的大量孔子思想，常常是讳莫如深，或径自斥为伪作。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背景仅仅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这一论题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那么，大量与孔子及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简帛文献的出土，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具有极大的可行性。诚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就先秦文学史来说，补写已不足以反映目前研究的水平，非得重写不可。这主要不是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史料方面提出来的问题。”^①

在出土文献中，2001年12月出版的上博简《孔子诗论》，无论对孔子文学思想研究还是对先秦文学史、《诗经》学史的研究来说，都称得上是惊人的发现。以往对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唯一可以取信的材料就是《论语》，但《论语》中记载孔子论《诗》的材料只有18条，是十分有限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存简29枚，凡1006字。内容既有对《诗》的总体概括，也有对“风”、“雅”、“颂”和具体篇章的讲解，共涉及《诗经》中的作品近60篇，是《论语》之外首次见到的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孔子论《诗》、论乐材料。上博简为楚国迁郢都（公元前278年）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是汉儒也未能见到的先秦佚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文献，《孔子诗论》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先秦时期《诗》的编次和诗学理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进一步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孔子的授《诗》方法都大有裨益。此外，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卷后佚书《要》、《繆和》篇里，也记载了孔子论《诗》的材料。这些新材料直接丰富了孔子《诗》学思想研究的基础文献，对孔子的文学思想研究的意义至关重要。

出土文献在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孔子诗论》这样新材料的同时，也为确定很多传世文献的作年提供了新证，从而打破了疑古学术视野中积弊已久的史料困境，解决了学术史上一些久讼

^① 廖名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见姚小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不决的悬案。如关于《易传》文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学术史上争论已久的《易传》的作者问题。关于孔子和《周易》的关系及其是否作《易传》的问题,虽然在《史记》、《汉书》中有极为明确的记载,但自宋代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怀疑其真实性后,又经过清代疑古学者和现代古史辨派的反复论证,《易传》的作者并非孔子似乎已成定论。在这其间虽有个别学者如金景芳先生的反驳,但在没有新材料出现之前,这种学术见解也仅能视为一家之言,无法得到普遍认同。

马王堆帛书《易传》之《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的出土,使否定孔子与《易》之关系的观点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廖名春、郭沂等人认为帛书《易传》为孔子易说,而今本《易传》,虽然有部分后人杂入,但《乾文言》、《坤文言》、《系辞》的主要内容皆为孔子所作,已可以成为定论。^① 这种学术的定位直接决定了我们对《易传》文学思想的断代选择,从而使《易传》的文学思想不再独立于孔子的文学思想之外,而是成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再如关于《礼记》的成书问题。中国古书的特点是在学派传承的过程中往往加以润饰和增添,疑古学者正是依据这一点,认为《礼记》的成书大体不早于战国末年,因此不能代表先秦思想。据历史记载,《礼记》是西汉前期于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收集所得的先秦古文献,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汉书·艺文志》)。这种看法到唐代之前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汉唐人看来,使用《礼记》的主要困难是“未能尽知所记之人”,而非如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晚出失实。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缁衣》出土于战国中期的楚墓,恰恰证明了《礼记》应为先秦典籍的观点。《礼记》作为先秦儒家著作这一史料定位一经明确,很多学者便开始重新考察书中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在出土文献方面术有专攻的李零先生经过详细地考证认为:“在《礼记》一书中,它的‘夫子曰’、‘子曰’、‘子云’、‘子

① 参见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8 年版;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